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高雄師大學報第十一期（民國八十九年）：77~93

王安石詠史詩試析

蔡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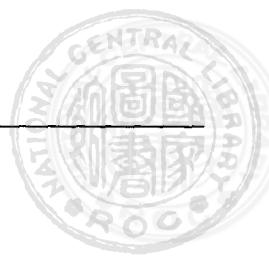
摘要

王安石是北宋傑出的政治家，也是優秀的文學家，他的散文與三蘇、曾鞏並稱為宋代古文大家，詩也極具特色。本文僅就王安石的詠史詩，配合其生平，深掘詩中內涵，呈現王安石的志趣、思想與感發，並加以歸納分析其藝術特色。希望能透過對王安石詠史詩的論析，深入其思想人格；也透過其獨到的眼光，燭照歷史，涵泳銳利的歷史評判。

關鍵詞：王安石、詠史詩、宋詩

*高雄師大國文系兼任副教授

國立嘉義師院語教系副教授



A Study of An-shih Wang's “Chanting Epics”

Jung-Tao Tsai*

Abstract

An-shih Wang was not only an outstanding statesman but also a remarkable litterateur in the Northern Sung. Because of his prose, he was dubbed, with Kung Tseng and “Three Sues”(i.e., Hsun Sue, Shih Sue, Che Sue), “one of the great me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n Sung Dynasty.” His poems were also enriched with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is aimed at discussing the contents of An-shih Wang’s “Chanting Epics” along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his biographical sketch in order to present his interests, thought, and feeling. In addition the unique features of his writing are analyzed inductively as well.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e commentary and analysis of Wang’s “Chanting Epics,” one can understand his thought and personality. Moreover, it is also hoped that by means of analyzing his unique power of judgment, one will apprehend the reality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be deeply absorbed in his acute historic judgment.

Key words : An-shih Wang, Chanting Epics, poetry of the Sung Dynasty

The author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Language Education in National Chiayi Teachers College and a part-time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i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壹、前言

王安石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位極特出的人物，他在神宗的器重下推行新政，改革時弊；他的散文和同時代的三蘇、曾鞏、歐陽修並稱，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也是宋詩的重要作家，詩文影響後世深遠。綜觀歷史上，在政治上能一展抱負、文學上又能有崇高地位者並不多見，王安石又是其中的佼佼者。

王安石詩文傳世極多，本文僅就其詩中詠史的作品，加以歸納分析，並論述其藝術特色，而詠史詩之中，常可見作者的志趣、思想、感發，本文在釐析作品的同時，也配合王安石的生平及作品繫年，深掘其詩文內涵。因此，本文第二部分略述與本文相關的王安石生平重要事蹟，以為賞析作品之準備，第三部分，將詠史詩從文集中選出，再加以歸納分類，並作深入的分析評述。第四部分則歸納王安石詠史作品的藝術特色。

貳、王安石生平略述

王安石，字介甫，北宋撫州臨川人（今江西省臨川縣）。生於真宗天禧五年辛酉十一月十二日，卒於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四月，享年六十歲（1021—1086）。^{註一} 王安石年少時已展露其勤學與文采，十七歲有〈憶昨詩〉（或作〈憶昨詩示諸外弟〉；本文有關王安石詩的作品繫年，皆參考蔡元鳳《王荊公年譜考略》）一首：

男兒少壯不樹立，挾此窮老將安歸？……
材疏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遐相希。

由此可知，荊公少時即以稷、契自期，慨然有經營天下之志。二十歲以前的王安石，勤學好思，以經略天下自期，是自我充實的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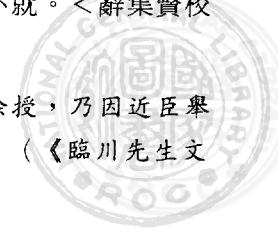
二十一歲，王安石入京應禮部試，登進士榜第四，隨即簽淮南判官，開始其仕宦生涯。三十歲，解官歸臨川，訪鄉人陳祁，有〈書陳祁兄弟壁屋〉：

千里歸來倦宦身，欲尋田宅豫求鄰；
能將孝友傳家世，鄉邑如君更幾人。

從這首詩可知，王安石於仕途並無太多戀棧，雖以經濟自期，然用行捨藏，理想無法實踐也不屈己媚俗，寧願歸隱鄉里，孝友傳家。

三十三歲，祖母謝氏卒，王安石歸臨川，朝廷詔召為集賢校理，不就。〈辭集賢校理狀〉云：

臣以先未葬，二妹當嫁，家貧口眾，難住京師。……今臣有此除授，乃因近臣舉薦，不加考試，又非條詔指揮。臣雖不肖，獨何敢冒過分之寵。（《臨川先生文



集》卷四十，此意又見於〈上歐陽永叔書〉，同前，卷七十四）

王安石的出處絕非以孤傲自清為高，而是嚴守分際；且其個性至孝，不願在喪服未除而任官。三十六歲，為群牧判官。此時喪服已除，又有歐陽脩力薦^{註二}，於情於理接應接受。

三十八歲，自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上仁宗萬言書，王安石曰：「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文集·上仁宗皇帝萬言書》卷三十九）他認為，時政的根本問題在於不知法度，即施政不合先王之政。然而，法先王之政，非將先王之政套用於當世，而是法其意；法先王也非以法古為高，而是為了改革世風，並且使改革阻力降至最低。在該文中，他認為「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才能不足，所以看不到合時宜、救時弊的革新。因此，他進一步提出「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等務實的方式來培養、拔擢人才，並一再強調人才的良窳多寡才是國家強弱的主要關鍵。細讀此文，可知荆公面對國家內憂外患時憂心忡忡，又恨鐵不成鋼，加上正直的個性，故針砭時弊毫無保留。若以此書批評王安石不厚道、強出頭，不免流於捕風捉影，而此文闡發的為政方略與精神，也是他後來推行新政的方向。四十一歲，又〈上時政疏〉（《文集》卷三十九）陳言晉武帝、梁武帝、唐明皇等享國雖久，終招災禍、亡身亂國，應引之為戒。進而主張明君須明法度、用賢才，並以「至誠詢考，而眾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期勉君上。這兩封見解卓著的奏章相隔不到三年，都是王安石面對國家財政與軍事危機時無法坐視不管而大聲疾呼，並提醒主政者重視人才的延攬與任用，但是並未受到重視。這段期間，王安石的作品中，常流露出知音難遇的感慨；對於無力改革的腐敗時政，他也在詩文中大力譏評。

英宗治平二年，荆公四十五歲，詔召赴京，以疾辭。治平四年，除知江寧府，旋即視事。^{註三}

神宗熙寧元年，王安石以翰林學士奉詔入對，與神宗有一場精彩的對話：

神宗謂荊公：「朕聞卿道術德義，有忠言嘉諫，當不惜告朕。方今治當何先？」

對曰：「以擇術為先。」

上問：「唐太宗何如？」

對曰：「陛下每事當法堯舜，唐太宗所知不遠，所為不盡合法度。……道有升降，處今之世，恐須每事以堯舜為法。堯舜所為，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高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為制也。」

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矣！然朕自視眇焉，恐無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輔政，庶幾同濟此道。」（《熙豐知遇錄》，見《王荊公年譜考略》頁424—425）

王安石的應對簡明有力，並針對時弊，態度不卑不亢，展現政治家的風範。神宗則虛懷納言，知人善任，乃知才之君的典型。此君臣相知相遇的情景，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多見，此段對話直是震爍古今，昭垂後世。神宗又問本朝百年太平的根本原因，安石退而上〈本朝百年無事劄子〉（《文集》卷四十一）闡述見解，認為今日正是大有為之時。^{註四} 王

安石以翰林學士，屢諫中肯之言，神宗日益器重，遂於熙寧二年，拜為參知政事，荆公時年四十九歲。荆公在〈除參知政事謝表〉曰：

矧睿謀之天縱，方聖治之日躋，恩稱所蒙，敢忘自竭。遠猷經國，雖或媿於前修；直道事君，期不隳於素。（《文集》卷五十七）

被重用的王安石並未志得意滿，而是戒慎恐懼地反省，是否有背前修、有虧素守，並自期能以直道事君，為國家貢獻心力，以報知遇之恩，充分表現儒者從政的風範。

王安石自熙寧二年任參知政事，至熙寧九年解除機務為止，前後執政八年，推行青苗、保甲、保馬等新政，銳意改革。期間，神宗的知遇使他能一展抱負，舊黨的反對也讓安石飽受無妄的譴責，^{註五} 這種種心情都明顯地表現在此時期作品之中。

熙寧十一年，王安石卜居鍾山，過著半隱居的生活。他優閒的心境可從〈寄吳氏女子〉詩中窺知：「夢想平生在一邱，暮年方此得優游。江湖相忘真魚樂，怪汝長謠特地愁。」（《箋註王荊公詩》卷四十二）此時，荆公也與僧道來往，參悟佛法，有「能了諸緣如夢事，世間唯有妙蓮花。」（〈次吳氏女子韻〉，同上，卷四十五）的體悟。

元豐八年（西元一〇八五年）神宗駕崩，哲宗即位。神宗的死對王安打擊甚大，他的〈題神宗皇帝挽辭〉說：「老臣他日淚，湖海想遺衣。」（《文集》卷三十五）悲傷之情溢於言表。神宗死後，新政相繼廢去，王安石眼見自己推行的新政，逐一被抬頭的舊勢力罷去而無能為力，其落寞之情可想而知。哲宗元祐元年，王安石卒於鍾山，得年六十六歲，相知相遇的君臣相繼謝世，兩人合力推展的新政也於該年完全罷除。荆公自五十八歲解職到六十六歲去世，一直住在鍾山的草廬，這段時期有禪詩、閒適詩及覽蹟懷古的作品，這些作品已不像前期的意氣風發，而是透顯出閒適、平和的心境。

參、王安石詠史詩分析

王安石的詠史詩約六十餘首，史論性散文近二十篇。^{註六} 數量相當多，佳篇也不少。本文主要是分析詠史詩，史傳體散文則作為比較論證的輔助材料。雖然，兩者都以歷史為題材，詩與文畢竟是不同的文體，書寫技巧與藝術特質都有差異。

關於詠史詩的分類，今人齊益壽曾據歷代說法，歸納六朝詠史詩為史傳、詠懷、史論三種類型^{註七}。史傳型的詠史詩首創於班固的〈詠史〉，班固這首五言的〈詠史〉作品，是以緹營救父為題材，將緹營救父的事件，依據史事濃縮成詩句，再於詩末抒發感嘆。這種寫法類似史傳的述與贊，齊益壽將此類作品歸納為史傳型，並且指出其特色為「但指一事」、「據事直書」、「有感歎詞」。這類作品是詠史詩早期的形式，內容較質樸無華，技巧尚可發揮有限，唐宋以後，創作者較少。詠懷型詠史詩則出於左思〈詠史〉八首，詩題雖然承繼班固的〈詠史〉，內容上則是藉詠史以抒發自己的懷抱、感慨。詠懷型詠史詩脫離史傳型大篇敘事的單調筆法，以濃縮的語句概述史事之後，即以大部

分的篇幅抒發感懷，提供作者自由揮灑的空間，也豐富了詩歌的意蘊。史論型則將史傳型之中的「贊」改為「論」，並將「論」提升為詩歌的主體。既然史論型以論為主，則其論的內容往往是作者別出心裁、獨具慧眼的歷史新解，其中就出現許多翻案的作品。這類作品以張華〈游俠篇〉為首^{註八}，六朝時期也只有顏延之〈五君詠〉五首可歸入此類^{註九}，自唐代以後，也逐漸受到文人青睞。

史傳型的詠史詩重在鋪敘，創作以古體詩居多；史論型、詠懷型可長篇大論、也可言簡意賅，大多以近體詩創作，古體詩也不少。^{註十}

綜觀王安石的詠史詩，以詠懷型與史論型為多，詠懷型多為神宗以前的作品，史論型則多作於居鍾山之後。所以，本文擬以這兩種類型歸納荆公的詠史詩，並選擇代表性佳篇試加論述。然而，在實際的作品之中，常會有融合兩種類型的作品，因此，歸類上也會有兩可的作品，然而，為了遷就本文的分類，仍就其內容的偏重而歸入其中一類。

一、詠懷型

如前所述，王安石少年時代已展露其經世之志，在其論時政的文章中，對時代風氣觀察深刻，提出的政策也能對症下藥，矯正時弊。然而，在王安石執政前上萬言書、時政疏都未被重用，目睹當是的憂患而無能為力，其抑鬱之情可想而知。在其作品中，常託其懷抱於古人，或言知音難遇，或言知人之難。如〈賈生〉曰：

漢有洛陽子，少年明是非。所論多感慨，自信肯依違。

死者若可作，今人誰與歸？應須蹈東海，不若涕沾衣。（《李注本》卷 24）

賈誼少有治才，遇文帝之英明，竟因讒言而不用。後貶為長沙梁懷王太傅，屢次上疏言時政，以為諸侯勢力太大，應加以節制。蓋賈生已經預見七國之亂，然文帝終不聽。^{註十一}

王安石在仁宗承平之世上萬言書、時政疏，直言時政之弊，蓋其憂危之心深矣。二人皆憂國於承平之際，卻同遭見棄，所以荆公以賈生自喻，抒發抑鬱之情。李鷹湖注此詩曰：「當時，天下皆已謂治安，而誼獨以抱火措薪為憂。」梁任公亦言：「文（筆者案：此指〈上仁宗皇帝萬言書〉）之切直而陳痛，至此蔑以加矣。當舉國酣醉於太平之日，而乃為此無忌諱之言，雖賈生之痛哭流淚，何以過之？而惜乎仁宗之不寤也！」、「漢文之於賈生，宋仁之於荆公，蓋極相類。」（《王荆公》頁 50、53）任公可謂荆公知音。

又〈臧倉〉曰：

位在萬乘師，孟軻猶不遇。豈云貧與賤，世道非吾趣。

意行天下福，事忤油然去。命也固有住，臧倉汝何與？（《李注本》卷 12）

此詩荆公藉孟子自喻。據《孟子·梁惠王下》記載，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阻撓，孟子遂不得見。孟子乃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認為聖賢出處，係關時運興衰，乃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能更改。王安石因小人讒言，未

獲重用，遂以孟子自喻，並嘆時命之未至。他另有〈孟子〉一詩，可與此詩相發明：

沈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

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李注本》卷 46）

孟子倡言性善之說，力辨王、霸與義、利，欲矯正時風，力挽狂瀾。在戰國之世，卻被視為迂腐。《史記·孟荀列傳》：「（孟子）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卷七十四）荆公推行新政改革時弊，時人多以爲迂闊不切實際。其〈上仁宗皇帝言事疏〉曰：「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也。」荆公深遠之見，世人以爲迂遠而棄之，遂引孟子爲知己。^{註十二} 關於聖賢遇不遇的問題，王安石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見解，〈鯀說〉云：

堯咨孰能治水？四月皆對曰：鯀，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鯀耳。……當此之時，禹蓋尚少，而舜猶伏於下而未見乎上也。……而堯之聖也，群臣之賢仁也，其求治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世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文集》卷六十八）

堯派鯀治水，鯀因治水失敗被殺的故事，眾人皆曉。王安石乃就當時群臣爲何一致推薦鯀、堯重用鯀這一點上加以發揮，說明賢才在位除了能力之外，還必須外在機緣的配合。當然，這也暗示在位者未必是賢才。「後世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除了表達自己不被重用的惆悵之外，也暗諷當朝者不盡賢人。

荆公的詠懷詩當以兩首〈明妃曲〉最傑出，其詠昭君和番，辭格超逸、悲歎哀惋，可爲千古名作。茲先節錄如下：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溼春風鬢角垂。低回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

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鄖城莫相憶。

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明妃出嫁與胡兒，……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

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心相知。

可憐青塚已蕪沒，尚有哀弦留至今。（《李注本》卷 6）

荆公此詩言昭君之怨，大抵不出前人，而哀怨尤深。其中論漢元帝回宮後斬毛延壽一事，議論突出，讓人印象深刻。前一首以陳阿嬌爲喻，抒發古今如一的失意，後一首則言人心貴在相知，胡主深情厚愛，漢帝寡恩無義，是其奇絕之處。據蔡元鳳《王荊公年譜考略》，此詩寫於仁宗嘉祐四年，公年三十九歲。此時王安石的仕途並不順利，且嘉祐三年，有〈上仁宗萬言書〉，所以，此詩蓋深有寓意。王安石陳言時弊，思欲變革，卻被視為迂闊不實，仁宗也不賞識，故發爲詠嘆：其爲毛延壽翻案開罪，實際就是自比處境；其言「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以慰昭君，其實也是自我安慰。第二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心相知。」歷來受到許多非議。如《李注本》

引范沖對高宗曰：「臣嘗於言語文字之間得安石之心，然不敢與人言。……安石言〈明妃曲〉則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心相知。』然劉豫不是罪過，……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爲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之心術。」其歸罪深絕，然亦不知詩。蔡元鳳將「恩」解釋爲「愛幸」，其言誠然。蓋漢皇送昭君以和親，其愛幸薄；單于寵愛昭君，其愛幸厚。而范沖對王安石的批評，也摻雜了黨爭的私見，實非公允之論。^{註十三} 細察這兩句詩，重點不在漢、胡之辨，而是以明妃境況自喻，並引之以此自我安慰，所以，兩句的中心在「知心」一詞，明於此，則可知荆公詩中微意。劉辰翁評曰：「正言似反，與小弁之怨同情，更千古孤臣、出婦有口不能自道者，……謂爲背君父，是不知怨也。」（《李注本》引）是知公之言。

荆公既然不見用於仁宗，抱負難以施展，對於歷史上虛心待賢者，常爲之讚嘆歌詠。如〈曹參〉：

束髮山河戰百功，白頭富貴亦成空。

華堂不著新歌舞，卻要區區一老翁。（《李注本》卷 46）

這首詩歌詠漢代曹參避正堂舍蓋公的事蹟。蓋公是膠西隱者，曹參使人厚幣請之，蓋公與曹參論治道，主張貴清靜而民自定，曹參採用其主張主政，大治。又如〈韓信〉曰：

貧賤侵凌富貴矯，功名無復在芻蕘。

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同上）

歷代詩人對於韓信的功績與成敗的詠嘆相當多，王安石僅就韓信降虜廣武君一事加以發揮，而傷嘆今不如昔。再如〈諸葛武侯〉云：

痛哭楊顛爲一言，餘風今日更誰傳。

區區庸蜀之吳魏，不是虛心豈得賢？（同上）

這首詩以虛心任賢歌詠諸葛武侯哭楊顛一事，亦傷餘今日無此餘風。以上三首詩都是荆公藉著歌詠古人之知人善任、虛心待賢的風範，而諷諭仁宗不知重用賢者。

王安石目睹時弊而無以爲之，對於當朝臣子未能興革除弊，有強烈的不滿，這種情懷常在其詠史詩中湧現。如〈讀唐書〉：

志士無時亦少成，中材隨世就功名。

并汾諸子何爲者？坐與文皇立太平。（同上）

王安石認爲當朝的大臣應是勉君從道，輔佐國君共同爲國家人民謀取福利。然而，即使是唐代盛世之時，「唐太宗所知不遠，所爲不盡合法度。」（荆公對神宗之言，見《熙豐知遇錄》）群臣則是「由來犬羊著冠坐廟堂，安得四鄙無材狼。」（〈開元詩〉，見《李注本》卷 12），君臣滿足現狀，苟安怠惰，則國亂民困之日不遠。合此三者觀之，則知荆公以古諷今，暗諭朝中無人、君臣苟安之意。

王安石受神宗器重後，推行新政，銳意改革。然而，毀謗之言也隨之而來。這時，荆公對政事與妄言二事最有所感。如〈商鞅〉一詩：

自古驅民在誠信，一言爲重百金輕。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李注本》卷 46）

由此詩可見荆公務實的政治理念，蓋政令的推行，第一步必先取信於民，樹立法令的權威與公正性，就這一點而言，荆公肯定商鞅的作爲。當然，在政治的理想上應依循儒家仁政王道的主張，在現實政策的推行則可參酌他家，不必拘泥一家之言。所以，王安石對政令必行的堅持與對商鞅的讚賞都足以顯示他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又如〈讀史〉曰：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終欲付何人？
當時黯黮猶承誤，末世紛紜更亂真。
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
區區豈盡高賢意？獨守千秋紙上塵。（同上，卷 39）

王安石認爲，史書所根據的資料常非真實，若史官又史識不足、妄加論斷，則常會誣妄前賢。荆公對史書的不信任與批判，除了展現他「盡信書不如無書」的批判精神之外，也是有感而發。他不僅當世遭譏謗，宋史其傳亦多誣妄，公之言古人即是言己，令人唏噓。劉辰翁評此詩曰：「經事方知史之不足信，經事方知史之難爲言。吾嘗持此論，未見此詩，被公道盡。」劉氏對荆公的洞見十分讚服。又，其古詩〈揚雄〉云：

子雲遊天祿，華藻銳初學。……
寥寥鄒魯後，於此歸先覺。
豈嘗知符命，何苦自投闕？
長安諸於儒，操行自爲薄。
謗嘲出異己，傳載固疏略。……
史官蔽多聞，自古喜穿鑿。（其二，同上，卷 12）

荆公以爲後世之譏揚雄，實出意妄，因此，極力爲揚氏辯解。他認爲，史官之穿鑿、道聽塗說、愚儒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造成誣妄的主要原因。荆公進一步指出，揚雄是漢代真正繼承孔孟道統的儒者，而爲王莽寫〈劇秦美新論〉是爲了活命的不得已作法，實在是爲儒者艱辛的遭遇做了最佳的註腳。所以，荆公在詩中以「晚歲天祿閨，強顏爲劇秦。」說揚雄的身不由己；再以「往者或可返，吾將與斯人。」表達其對揚雄的推崇嚮往之意。除了兩首古詩之外，荆公另有〈揚子〉七絕三首（見《李注本》卷 48），可參看。

綜觀荆公的詠懷詩作品，概爲其身世之感而作。少時之作，展露出荆公經略大志；神宗之前，多傷感知己不遇的作品，以詠古自喻的內容爲主；爲官後，則多是對妄遭譏嘲的抒發。



二、史論型

王安石的史論型詠史詩中，翻案作品不少，與其史傳體散文的周密宏博比較，史論型詠史詩顯得精短出奇。如〈宰嚭〉：

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
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裡有西施。（《李注本》卷 48）

歷來反省吳國興亡，多以西施媚惑夫差為主因，荆公卻為西施平反，認為亡國的責任歸根究底應在謀臣宰嚭身上。所以，這首詩從謀臣與小人著意，認為國君能誅小人，則自然勸進良臣，所謂「親賢臣，遠小人」之意。明人楊希閔曰：「近人詠明皇云：『但使姚崇還作相，君王妃子共長生。』與荆公議論不謀而合。」（蔡元鳳《考略》頁 127 引）可見荆公將國家興亡歸之謀臣良窳的見解，到了明代仍受到推崇，尤其是當人們習慣簡單地將一國之亡歸罪一女子時，荆公的見解顯然是深刻而較符合史實的。又如〈范增〉：

中原秦鹿待新羈，力戰紛紛此一時。
有道弔民天即助，不之何用牧羊兒。
鄒人七十謾多奇，爲漢歟民不知誰？
誰合軍中稱亞父？直須推讓外黃兒。（《李注本》卷 46）

世人對楚漢相爭，楚所以失敗的原因，往往歸咎項羽剛愎自用，不知善任人才。然而，項羽卻也一直信任范增並重用他，荆公在這首詩中，特地提出范增的不足。尤其是為漢召楚國遺民而立義帝之舉，其實是極為不智的。蓋號召遺民何須立義帝，項羽本身即是楚國貴族，所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國對秦的宿怨極易被挑起，以項籍或項羽即可號召。此舉不但可以看出項羽與范增的眼界狹隘，無法體察中國自秦以來，已經進入大一統帝國的歷史潮流，更造成日後項羽誅殺義帝，成為劉邦討伐的藉口。因此，立義帝之舉實在百害無一利。其次，項羽在戰場上誅戮甚多，尤其攻城之後常會阬殺軍民，失卻人心，莫此為甚。外黃之役就是如此，然而，卻不見范增一言半語力爭，尤其在秦卒降楚之後，背信阬殺數十萬秦卒，更是種下日後敗亡的原因。基於此，荆公認為，范增實有愧於「亞父」之稱。王安石的翻案都基於史事，字字有據，令人拍案叫絕，劉辰翁評此詩曰：「特見」，誠然是精彩的見解。關於項羽的敗亡，王安石也有精彩的見解，〈烏江亭〉詩曰：

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迴。
江東子弟今雖在，肯爲君王卷土來？（《李注本》卷 47）

唐杜牧詠項羽曰：「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弟子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題烏江亭〉）杜牧的詩意新穎，為項羽的失敗深感惋惜，認為項羽應回到江東，重整旗鼓，再與劉邦決戰中原，則楚漢爭霸的勝負猶未可知。王安石在同題詩中再就杜詩翻案出奇，立意全反，亦別出心裁。他認為就當時情勢與士兵心裡狀態，捲

土重來已經不可能。

王安石對史事別具洞見，也可從他描寫漢代人物的詠史詩中窺見。如〈漢文帝〉一詩：

輕刑死人眾，喪短生者偷。仁孝自此薄，哀哉不能謀。

露臺惜百金，灞陵無高丘。淺恩施一時，長患被九州。（《李注本》卷 12）

史家論評漢代有所謂文景之治，對文帝行黃老之術、政簡刑輕都給予相當高的評價。王安石在這首詩中，卻無一句讚美之詞，反而批評文帝輕刑、短喪造成世風日壞，這種結果雖非文帝立政本意，卻也難辭其咎。詩的後半，王安石批評文帝露臺惜金、節約灞陵等都是一時淺恩而造成後世災患，所以，他以「淺恩施一時，長患被九州。」評價文帝的治世，展現其不凡的歷史洞見。劉辰翁評此詩曰：「與少刻第，嚴重如史筆。」誠然。蓋荆公於〈本朝百年無事劄子〉嘗言仁宗寬恭儉讓而不行富國強兵之術，此蓋以漢文帝託寓仁宗。

又如〈漢武〉：

壯士悲歌出塞頻，中原蕭瑟半無人。

君王不負長陵約，直欲功成賞漢臣。（同上）

王安石用簡短的篇幅，把武帝好大喜功，多征伐而民生凋敝；高祖之善猜疑，都一一道盡。尤其是對武帝的評價也能翻陳出新，從百姓的角度重新思考漢代強大國勢所付出的代價。所以，劉辰翁評曰：「形容武帝不須多。」又如〈賈生〉：

一時謀議略施行，誰道君王薄賈生？

爵位自高言盡費，古來何啻萬公卿？（同上，卷 46）

一般論斷賈誼生平遭遇，多以司馬遷〈屈賈列傳〉的角度，為賈生不被文帝重用而哀惋不已。王安石再另一首〈賈生〉詩（卷 24，前文已分析，可參看本文 80 頁），也沿用這種觀點，而這首則反其意而行，認為賈生之言已經部分獲得採用，文帝待之已經不薄。這種斷案異軍突起，言前人所未言，不但推翻前人見解，也不同於自己的看法。又如〈讀漢書〉云：

京房劉向各稱忠，詔獄當時跡亦窮。

畢竟論心異恭顯，不妨迷國略相同。（同上，卷 44）

漢元帝時，嬖臣弘恭、石顯用事，京房、劉向等深惡之，上書勸諫。後來，京房與劉向因言災異，一人棄市、一人入獄，後世以忠臣評價二人。荆公對於兩人的忠誠也加以肯定，然而，他也指出兩人倡言災異，也和弘恭、石顯的誤國無別。荆公這種論斷是通達而深刻，也是比較合乎歷史事實，蓋人的功過很難一概論定，荆公對於京房、劉向不同層面、多層次的評價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災異之言並非漢代專利，考諸宋史，曾有尤瑛以「天久陰、星失度」；文彥博也以新政使得華山崩等災異的說法詆毀王安石，荆公對災異之荒誕誤國，應該深有體會，而此首詩也更顯得意味深長。

王安石一生曾位極人臣，參贊樞機，然而，也挫折連連。面對蜂擁而至的訕謗，他總是辭職以明志，毫無戀棧之意。蓋儒者從政的態度，本來就是「從道不從君」，懷抱理想，希望能夠淑世濟民，權位只是實踐理想的憑藉，國君充分的信任與授權才能真正落實理想，如果國君不再信任、國人皆曰不可，在堅持理想與尊嚴的情況下，儒者寧願選擇去職歸鄉。因此，雖然儒者有積極用世的態度，也會在理想實踐無望的情況下，欲遷居九夷，或「乘桴浮於海」。畢竟，邦有道或無道非我輩所能掌握，雖然出仕是盡君臣大義，當事不可為之時，仍要能全身而退，不必要做無謂的犧牲。因此，仕與隱的選擇，是知識分子的處世掙扎，也是其優游不同政治環境的用世智慧。王安石的詠史詩中，常透露出隱居的心裡傾向，也就不足為奇了。如〈邵平〉曰：

天下紛紛未一家，販繪屠狗尚雄誇。

東陵豈是無能者，獨傍青山手種瓜。（同上，卷 44）

秦末易鼎之際，群雄蜂起逐鹿中原，英雄人物亦趁勢而起，再造時勢。而在政權更迭、天下無主的情勢下，英雄無論出身，只要有才幹、又能掌握時勢，都可能成為造時勢的英雄。所以，即使是像販繪之徒灌嬰、或屠狗之輩樊噲都能趁勢稱雄，而東陵侯邵平卻種瓜東門，不與爭逐，此種情勢下的隱者都是清明的智者，蓋蜂起之時，共同患難建立績業，一旦功成名就，就是利益分配爭奪的赤裸鬥爭，歷來開國功臣常未有善終，例如韓信就是最佳例證。因此隱居者有其清明卓見，非逃避懦弱可以簡單概括。荆公獨標邵平之風，除展限其不凡見解，也是心境自況。又如〈讀蜀志〉：

千載紛爭共一毛，可憐身世兩徒勞。

無人語與劉玄德，問舍求田意最高。（同上，卷 46）

這首詩是就《三國志·魏志·張邈傳》中，劉備謂許氾之言：「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而發。王安石以為，劉備雖有經營天下之志，然而，蜀漢歷二世而亡，所謂「救世之意」，終究徒勞無功，不如求田問舍為高。這首詩或許反映王安石的某種心境，他推行新政之際，遭受囂囂之口的譏謗，新法推行初期雖然有些成效，晚年也全遭廢棄，改革時弊的大業也是功虧一簣。劉辰翁曰：「愈讀愈恨！」誠是善讀荆公詩者。

肆、王安石詠史詩的特色

人們面對歷史，常會興起兩種情感：一是讚美，一是反省，而兩種情感的基礎都是觀古鑑今。今日已無而昔日多有，故發為歌詠；今日所聞異於典籍所載，故有省思。文人透過敏銳的心靈，在反省讚美歷史時，常寄託豐富的情感於篇章中，使歷史人物與事件呈現多采多姿的樣貌。綜觀王安石的詠史詩，表達其精到的見解，也反應其思想與遭遇，極具個人特色，讀之令人擲筆三嘆、低迴吟詠而不忍釋卷。以下就個人所見，歸納

荆公詠史詩的特色。

一、借古諷今，感懷身世

王安石的一生，在神宗以前，仕途並不如意，故常借古人景況自喻。如〈賈生〉一詩即是。或者歌詠古人知賢之德，如〈曹參〉。這類作品都是在抒發其懷才不遇的感慨。王安石無法進入決策階層，對主政者當然期許甚高，然而，在位者常是讓人失望的。面對世風日益腐敗、朝綱不振，君臣卻陶醉在太平的假象之中，不知居安思危，遑論面對弊病，提出興革。所以，荆公在詠史詩中也藉詠嘆歷史而加以諷諭，發揮詩教的功能。如〈開元詩〉、〈讀唐書〉都是此類作品。

唐宋以來，詠懷的作品與諷諭的詩文或藉古以舒懷、或藉古以諷今、或自期古人以高其志、或借古事以微其言，不但能獲致委婉含蓄的藝術成就，也容易達到諷諭的效果。

荆公的詠懷詩也透過藉古諷今的技巧，表現抒懷、刺世、勸諫的內容，而且表達得相當成功。

二、根據事實，翻案出奇

詠史作品常用的技巧，除了上述藉古諷今之外，翻案的手法也廣泛運用。「翻案」，原來是法律名詞，本指推翻已經定讞的罪案而定，引申有推陳出新、變通濟窮、反常合道的意思。^{註十四} 在詠史詩中，對古人古事給予新的評價與地位就是翻案。

荆公的詠史詩中，翻案佳作連篇，如〈明妃曲〉、〈范增〉、〈賈生〉、〈邵平〉等。這些作品雖有出人意表的結論，但細察其詩，皆持之有據、言之成理，絕非妄臆私斷、標新立異。^{註十五}

荆公詠史詩的翻案手法，常從不同的角度，給予古人古事新的評價與定位，如〈范增〉、〈烏江亭〉等詩，皆發人所未發。而在翻案作品之中，也託喻自己的際遇，如〈邵平〉、〈讀蜀志〉。^{註十六} 李燕新以「論事精闢」與「翻案出奇」為荆公史論型作品的兩大特色（〈王荊公詩探究〉頁 76），這兩種特點用來說明詠史詩也是非常恰當的。

三、觀點多面，立意新穎

詠史詩既是對歷史的反省，其反省可小至一人一事，亦可大至一朝一代。荆公的詠史詩運用微觀與宏觀兩種觀點詠嘆翻案，都能不落俗套。如〈讀蜀志〉、〈讀漢書〉都是藉一人一事以抒懷，也綜觀時代風尚，就是將兩種觀點靈活運用，開創新意。蓋每個時代都有其典型人物，藉著這些典型的描寫，可以窺見時代的風貌。荆公善於運用宏觀、微觀兩種方式描寫人物與時代，不但使文氣活潑、文意新穎，也頗具史筆的規模。

伍、結語

從荆公的詠史詩可以看出他強烈的身世之感與疾誣妄的求實精神。荆公的作品大多表達其身世的感慨：執政前，改革大計無可施行，大志難伸，荆公藉古人遭遇自況，抒發鬱結的心緒；執政後，新政既行，謗言迭起，荆公透過作品，對史事、典籍的虛妄大家撻伐。荆公的詠史詩感慨史書之誣，就像是在替自己後來的史評翻案一樣，配合生平遭遇讀荆公的詠史詩，再省思其遭後世的誤解，真令人不勝唏噓。而今，如果我們不以成敗論英雄，而將其文對照其人，那麼，我們應該肯定，荆公是一位儒者、孟子所謂的大丈夫，更是偉大的政治家。

附 註

- 註一 對於王安石的卒年，諸家無異說，但其歲數，有六十八、六十六兩種說法，今據後者，詳細考證參見清蔡元鳳《王荊公年譜考略》卷一，頁39；卷二十四，頁323。
- 註二 歐陽脩〈再論水災狀〉：「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議論通明，兼有時才之用。」
- 註三 〈辭赴闕狀〉：「臣抱病日久，未見跋涉。」（《文集》卷四十）又，〈知江寧府謝表〉：「始弗願於承流，以比造朝，或未妨於養疾。矧恩勸之屢迫，且遙避之所不容。」（《文集》卷五十六）可見王安石一直以健康不佳請辭官職，但是，江寧知府一職則辭之不允，遂勉強接受，且江寧府為其熟知之處，政務雖煩，無礙於養病，故接受該職。
- 註四 王安石認為，太宗、真宗、仁宗、英宗能守成，以簡儉謙仁自守，故享國百年，天下無事。然而，利之所至，弊亦隨之，「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因此小人居廟堂，邪說時作。科舉、官吏、農賦、軍事等國政日益頽壞，幸好外患並非昌熾，又無水旱天災，故能享平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基於此，安石期勉神宗「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怠」，應奮發有為。
- 註五 王安石於新政受質疑時，常辭職明志。熙寧七年，光州司法參軍鄭俠上書言新法之害，王安石即辭去要職。關於此次去職，楊希閔有中肯的評斷：「新法之行，實神宗急於求治之過，荆公卻欲緩圖，進說神宗屢矣。外廷或不知，或知之不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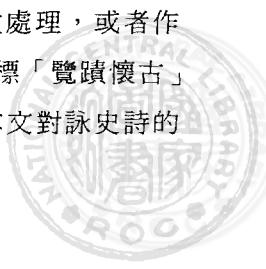
斥君上，遂集矢荆公，皆未可定。然而，神宗、荆公未有不各知也。故荆公一聞謗言，即懇請去位，其身心之無繫可見；神宗則必強留，諒其疑似之間，每受謗誣亦可見。」（《熙豐知遇錄》案語，見《王荊公年譜考略》頁 446）

註六

王安石的詠史詩，據筆者檢索結果，有六十五首，目次如下：〈四皓〉兩首、〈謝公墩〉三首、〈老景〉、〈雜詠〉、〈張良〉兩首、〈司馬遷〉、〈諸葛武侯〉兩首、〈讀墨〉、〈讀秦漢間事〉、〈明妃曲〉兩首、〈和吳御史汴渠詩〉、〈澶州〉、〈即事六首〉之其三、其五、〈孔子〉、〈揚雄〉三首、〈漢文帝〉、〈秦始皇〉、〈韓信〉、〈叔孫通〉、〈東方朔〉、〈揚劉〉、〈田單〉、〈戴不勝〉、〈杜甫畫像〉、〈雙廟〉、〈晚歲懷古〉、〈偶書〉、〈窺園〉、〈邵平〉、〈中牟〉、〈王章〉、〈神物〉、〈文成〉、〈讀漢書〉、〈賜也〉、〈孟子〉、〈商鞅〉、〈蘇秦〉、〈范睢〉、〈曹參〉、〈韓信〉、〈伯牙〉、〈范增〉兩首、〈賈生〉、〈兩生〉、〈謝安〉、〈讀後漢書〉、〈世上〉、〈讀蜀志〉、〈讀唐書〉、〈讀開成事〉、〈烏江亭〉、〈漢武〉、〈嘲叔孫通〉、〈張工部廟〉。形式上含古體詩、絕句、律詩；內容則含括唐以前的人物、史事，尤其集中在先秦與兩漢。史傳體散文則有〈伯夷〉、〈祿隱〉、〈周公〉、〈子貢〉、〈楊孟〉、〈夫子賢於堯舜〉、〈鯀說〉、〈季子〉、〈荀卿〉、〈楊孟〉、〈老子〉、〈莊周〉、〈委任〉、〈讀孟嘗君傳〉、〈讀柳宗元傳〉、〈中述〉、〈夔說〉、〈三聖人〉等十八篇。

註七

詳參齊益壽〈談六朝詠史詩的類型〉，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十卷四期。方瑀則認為應再加上「覽蹟懷古」一型（見氏著〈李商隱的詠史詩〉，中外文學五卷十一、十二期）。徐亞萍《唐代詠史詩與中國傳統士文化關係之研究》認為，所謂「詠史詩」，是指「凡詩歌中以詠嘆歷史題材為主體的詩」（頁 143），也就是「借歷史題材來表達個人之見解、襟懷、理想與苦悶，或借古喻今，以反應當時之現象。（頁 136）」基於此，徐氏區別懷古詩與詠史詩，主張懷古詩「僅寫滄桑之感，不聯繫具體的古人古事。」（頁 139）也就是在懷古詩中，作者僅以歷史古蹟為媒介，興發滄海桑田之感慨，並未針對具體的史事、人物、場景引發抒懷或議論。而覽蹟懷古的作品中，有些只是將歷史人物、事件當作典故處理，或者作者抒發泛泛的滄桑感，這些作品都不能列入詠史詩。所以，方瑜新標「覽蹟懷古」一型的作品，或非詠史詩，或可納入齊先生的分類之中。因此，本文對詠史詩的分類仍以齊益壽的分類為據。



- 註八 參見徐亞萍《唐代詠史詩與中國傳統士文化關係之研究》第四章，頁130。
- 註九 參見齊益壽〈談六朝詠史詩的類型〉。
- 註十 參見李燕新〈王荊公詩研究〉第二章第二節，頁76。
- 註十一 參見《史記·屈賈列傳》卷八十四。
- 註十二 王安石對孟子相當景仰，除了已經引述的詩篇之外，還有〈秋懷〉：「柴關半掩掃鳥跡，獨抱殘編與神遇。韓公既去豈能追？孟子有來還不拒。」（《李注本》卷18）〈奉酬永叔見贈〉：「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李注本》卷33）孟子對世道改革的熱情與「雖千萬人往矣」的氣勢都在王安石的生命中展露無遺。
- 註十三 參考《王荊公年譜考略》頁125—126。
- 註十四 參考張高評〈宋詩翻案的層面與價值〉，第一屆所友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高師大國文研究所，78年5月，頁167。
- 註十五 王安石的史傳體散文也有許多精彩的翻案作品，如〈讀孟嘗君傳〉，王安石推翻歷來認為孟嘗君能養士的看法，看似立意出奇，卻是以《史記》的贊語為主，並透過深入的分析所得的結論，非僅以翻案出奇。
- 註十六 荆公史傳散文的翻案手法，主要是批駁古書之妄，如〈周公〉批評《荀子》所載周公之得士、孔子與顏回言仁智之誣。荆公在這類散文中，主要是表現其博學與論述精闢的特色。

參考書目

宋 李 壁註	箋註王荊公詩	台北：廣文
劉辰翁評		
宋 王安石	臨川先生文集	台北：華正 1975
明 茅 坤 評選	王荊公文鈔	台北：中華 1970
清 蔡元鳳	王荊公年譜考略	台北：洪氏 1975
梁啓超	中國六大政治家－王荊公之部	台北：中華 1970
齊益壽	談六朝詠史詩的類型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十卷四期
方 瑙	李商隱的詠史詩	中外文學五卷十一、十二期

張高誼	宋詩翻案的層面與價值	第一屆所友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高師大國文研究所，78年5月
李燕新	王荊公詩探究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 1978
徐亞萍	唐代詠史詩與中國傳統 士文化關係之研究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 1999

